

研究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目的性价值判断，也就不可能充分自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这样的研究者结果甚至也就不知道该对什么样的研究对象采用“信息公开”“责任说明”“对话”等“验证程序”。

#### [IV]

#### 结语

在现代中国研究领域，一种相互联动的“共同主观性”在中日两国之间施加着影响。在这种“共同主观性”中，存在着以“东方主义”为代表的认识偏见，也即将欧美世界放在“主体”位置，而将亚洲世界（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视为“客体”，并给予“主体”以优越性。而率先洞察到这一点的就是竹内好。

如同前面提出的沟口雄三对竹内好的批评那样，竹内好将中国视为可以照见日本的“镜子”，或者说在日本这面“镜子”中观察中国，采取了将彼此作为映照对方的“镜子”的方法来观察中日两国。作为认识中日两国间“共同主观性”的偏见并欲加以克服的方法，竹内好将研究的主客体定位在像镜子一样的“等价”关系的确有一定效果。但是仅仅这样，并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中日两国之间以及亚洲与欧美之间长期存在的“共同主观性”的偏见即“东方主义”。

1989年3月，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

结》<sup>61</sup>中明确提出，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推动了欧美现代化的自由主义将凌驾于其他所有的政治理念之上，自由主义作为黑格尔定义的“绝对精神”已经步入了“自我实现”的最后历史进程，这种认识直到今天仍处于支配地位。福山乐观地推测，这个最后的历史过程将向“成熟的无政府状态”（B·布赞）或者“安定体制”发展。但是1992年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sup>62</sup>则悲观地论述了自由主义文明与非自由主义文明之间的冲突，预测世界将可能走向“不成熟的无政府状态”。<sup>63</sup>

尽管悲观论、乐观论各有不同，但是福山和亨廷顿都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作为“欧美现代化”的理念，自由主义已经进入了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扩展”的阶段。这种推断直到今天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美国布什政权以“自由主义”国家间从未发生过战争为由，明确表示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自由主义才是美国和世界安全的基础，而在实际行动中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将“东方”和“西方”之间产生的共同主观性偏见称为东方主义并加以批判，是萨依德和科文的重要贡献。尽管如此，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却只能说这种偏见正在扩大。

下一部分将以“竹内好再考”为中心，探讨从何处入手，可以发现在这一点上进行方法论范式的转化。

- 1 毛里和子在其《现代中国政治》（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3年）〈序章〉中开门见山地说：“中国总是出乎观察者的意料”，并就此议论为何会在对现实的认识和对未来的预测上产生谬误。同样，天儿慧在其《中国：变化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也明确提出：“我国的中国研究为什么总是一贯地被当时的中国‘现实’所翻弄呢？”，并以此开始讨论中国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 2 例如船桥洋一的《内部》，朝日新闻出版社。
- 3 丸山真男：《增补版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未来社，1964年。
- 4 吉本隆明对丸山政治学进行批判，认为其只不过是“大众”作为一个虚拟的形象。
- 5 这里引用的“世界观”是指对世界进行认识时，规定此认识的价值判断体系或意识形态体系。
- 6 列维·斯特劳著、室淳介译：《伤感的南回归线》（上、下册），讲谈社，1985年。
- 7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2nd Enlarged Edition, 1970. 托马斯·度恩著、中山茂译：《科学革命的构造》，美铃书房，1971年。